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山東省益都縣委員會



目 录

坚持战斗在四边县

..... 王乐三 (1)

益北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与发展琐忆

..... 陈景三 (18)

益都农民暴动及失败的原因

..... 县党史办公室 (35)

马鞍山战斗与我的 ~~一段人~~

..... 冯毅之 (53)

活动在敌人心脏里的马功臣和他的特务大队

..... 张建平供稿 文史组调查整理 (70)

回忆何基沣将军 ~~时~~

..... 钟天声 (91)

我们所知道的宋传典

..... 冯宝光 王钧堂

摘自省《文史资料选辑》 (104)

山东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简介

..... 齐成志 (114)

益都一中校史纪略

..... 王子政 杨高明 左景仁 (120)

基督教在益都办学概况

..... 齐成志 (144)

杀人魔王陈有诰

..... 文史组调查整理 (166)

衡王与衡王府

..... 王道荣 (182)

益都县城沿革

..... 王子政 (197)

镇江战役纪念碑

..... 钟 轶 (200)

坚持战斗在“四边县”

王 乐 三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当时，我在清河区党委所属的四边（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县委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与县委其他同志及当地群众一起，坚持了为时一年半的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回忆那段艰苦的斗争历程，对继续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是很有意义的。

一

位于胶济铁路北侧的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县边区，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是我党领导的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为把中国变作它的后方基地，集结重兵对付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我根据地进行了

大规模的反复“扫荡”，大搞所谓“强化治安运动”。我四边的形势随之急剧恶化。到一九四二年初，原来的游击区被日伪蚕食成为相当狭小的一块，东西只有二十华里，南北不到十华里，总共只有二十几个村子可以公开活动，被称之为“东西一炮轰透，南北一枪打穿”的游击区。县委和许多基层党支部都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坚持这里的抗日斗争，清河区党委及时作出决定，委派地委宣传部长李荆和同志前来四边县任县委书记，委派专员王兴国同志兼任四边县县长。不久，王兴国同志调离，改由赵治安同志任县长。我就是在这时由广南县调来四边县委的。县委成员还有独立营教导员陈瑛同志和宣传部长张星文同志。

新的四边县委刚刚建立起来，就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日伪军于七月一日，对四边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六月三十日半夜时分，我们得到十万火急的确切情报，说有四千多日伪军要合围“四边”县，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我们必须立即暂时跳出去。因为时间紧迫，县委机关和县独立营已来不及跳出了，就决定暂时转移到北辛庄。那是个十来户人家的偏僻小村，县党政军机关和三个连的武装部队共三百多口人，一下子集中隐蔽在这

里，使每一家都挤得满满的。幸好北辛庄地处四边县的边沿，一向不被敌人注意，加上群众基础较好，所以鬼子、伪军一批接一批从村边走过，却始终没有发现我们。就这样，县委机关和部队未受任何损失。等到第二天晚上，顺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只留下赵治安和陈瑛各带几名战士在当地坚持斗争。

在这次“扫荡”中，灭绝人性的日寇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铁蹄到处，鲜血流淌，一片焦土。当时，留在那里的同志处境极其艰险。赵治安等同志白天不能进村，就隐蔽在永和村的大洼里。夜间秘密到基点村里去活动后，再回到大洼里露宿。敌人“扫荡”时，就隐蔽到大洼里的枯井内。

“七一”大“扫荡”后不久，我同其他同志又回到了四边县。因敌人“扫荡”后，又多次对四边进行了“梳篦清剿”，并在四边县内修筑了数十座炮楼，在各村建立了伪政权，四边县完全被敌人占领，所以我们的活动都十分艰难。我们很少进村过夜，青纱帐就是我们的家。记得情况最吃紧的日子里，我在南卧石一带的高粱地里隐蔽了二十多天，一天能啃几张当地群众和干部送来的煎饼，就算是美餐了。口渴了就喝水沟里的泥水。一天，我呆在高粱地里，中午烈日当

空，酷暑难挡，嗓子都干得冒烟了，而附近的水沟都干枯了，白天又不能进庄子，只好咬紧牙关熬着。好不容易盼到天黑，天气骤变，下起了大雨。这下可好了，我就仰雨朝天，躺在地上，张大嘴巴接雨水解渴。可是，雨越下越大，高粱地里全是水了。夜里无法躺下，我就在地势高一些的坟地里，用高粱杆撑着条破被单遮雨。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克服着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顽强地坚持着抗日战争。

日寇对四边县的摧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今天“铁壁合围”，明天“梳篦清剿”，一年中仅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近二十次。敌人除反复“扫荡”外，还竭力收买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如张景月、徐振中、李青山、王砚田（外号“一眼六”）之流。他们还千方百计从我们革命内部收买叛徒，合伙对我抗日军民进行血腥镇压。

南卧石村村长李德亭与我们有关系，为抗日做了不少好事，后来被汉奸发现。一天，“一眼六”的部队突然包围了村子，把李德亭捕去，惨无人道地用刀把他一块一块地割死了。

一九四二年五月的一天下午，刚调任益都县委书记的丁亦民同志跟我和四边县委的另外几位同志，到南下庄召开了一个“红五月”宣传大会，对当地群众进行了一次坚持抗战的鼓动宣传。做

会以后，我和丁亦民同志分了手，他在南下庄住下了，我到了附近的村里。第二天拂晓，敌人突然“扫荡”南下庄。我听到南下庄方向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就估计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枪炮声刚停，我赶急跑到那里。村里的群众说，有一位同志被敌人烧死，全身如焦炭，认不清面目了。我到现场仔细察看辨认，才认出死者就是丁亦民同志。一九四〇年我认识他时，他才二十三岁，刚在寿光结婚只有几天就奔赴益都县委工作。见到自己的战友，遭此毒手，我心中极为悲痛，胸中怒火燃烧。我和区委书记李华村等人，含着眼泪把烈士掩埋在一个土地庙里，把敌人欠下的这笔血债牢记心中。

一九四三年二月间，敌人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一天晚上，寿光五区新建的一个游击小队在永和庄宿营。后半夜，叛徒李树德向附近的国民党投降派告了密。敌人摸上来时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随即鸣枪报警，可是已经晚了，同志们冲出庄子就被敌人包围了。区中队长刘德之、指导员郭同德同志（五区区委书记）当场牺牲，两名战士被俘，游击小队遭到了极大损失。

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我们中华民族有多少优秀儿女，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呵！万恶的日寇和民族败类，妄想用这种极端残忍的手段征服

我们，然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杀不绝，吓不倒的。敌人的残暴，只能激起英雄的抗日军民更坚强的斗志。

二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日子里，四边县内真可谓“出门见碉堡，抬头是岗楼”。白天，路上几乎见不到行人，只有鬼子、汉奸的巡逻队到处耀武扬威地行凶作孽。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我们还能不能打游击？能不能保留武装部队？能不能主动地寻找战机杀伤敌寇？边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场很严峻的考验。

尽管当时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见一次面、开一个会都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在群众基础最好的刘家集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比较了敌我双方的力量，看到了在四边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性，决定大胆采取“敌进我亦进”的战略和灵活机动的“翻边”战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声东击西，跳进跳出，灵活作战，把抗日武装斗争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坚持下去。

我们的武装力量，主要是四边县特务大队。该大队是在敌人“七一”“扫荡”时，县委和县独立营暂时转移后，清河区党委从司令部警卫连和县

独立营中选派的骨干力量组成的。开始由陈景三同志任大队长，陈瑛同志任教导员。陈景三同志不久被捕，由陈瑛同志任大队长，李荆和同志兼任政委。这支队伍基本上都是四边的子弟兵，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他们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而且装备也较好，班排干部每人配备一长一短两件武器。因此，它的人数虽然不多，仅三个分队六个班，但它一成立，就象一根钢针铁钉，牢牢地扎在了敌人已经占领了的四边县。

一九四二年大“扫荡”后，县委一连几个月与区党委失掉了联系。那年冬天，县委决定让我带一个班到清河区党委，向军区汇报工作。我们避开了敌人的层层封锁，一夜急行军七十华里，冒着严寒，过了冰封的小清河，赶到了军区所在地。杨国夫司令员和刘其人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取了我们的汇报。首长们肯定了我们取得的成绩，又向我介绍了上级转发的一份冀中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经验报告。我捧着那份厚厚的复写记录稿，如饥似渴地看呵，看呵，浑身增添了力量。记得刘政委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的处境并不比长征时好多少。要作最艰苦的打算，要注意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攻。”

我们根据首长的指示和当时的斗争形势，为

了对付敌人的保甲制度和叛徒的出卖，把党员、干部分为一线和二线。一线主要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二线则利用各种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秘密地地下活动。县委的同志各负责一片，依靠专门建立的联络线传递消息，交换意见。县特务大队也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组，白天绝对隐蔽，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碰头。在敌人“扫荡”最疯狂，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就大胆地运动到离敌人的据点最近的村子，甚至干脆到敌人的鼻子底下，住到当时一些很出名的大地主、大乡绅的家里。我们先把他们的孩子看起来，那些家伙也就特别听话，不敢去向鬼子通风报信，招待得还特别周到。我们就这样在敌人的炮楼下面安全隐蔽，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擦枪磨刀呢！

在艰险的环境里，同志们之间的关系特别好。同志们总是把方便、安全让给别人，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记得警卫班有个叫殷继畔的同志，每到一处宿营，他总是睡在门前的地上，从不上炕。三年如一日，一直这样默默地守在门口，用生命保卫着县委领导和战友们的安全。还有刘汉民同志，总是枪若去干最艰苦、最危险的侦察、联络工作。后来这两个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但他们的事迹，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

由于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们的武装力量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还经常抓住战机给敌人以打击。有一次，汉奸李青山的特务连，从东李庄到了刘家集。我们估计敌人可能从刘家集直回大王桥，就在青纱帐中秘密地行进到刘家集北的磨盘地设下埋伏。磨盘地的地形很特别，四边是坡，西南是条沟。当时陈璞同志作了个大胆的部署，正面仅放了三个人，东面、东北面各配备了一个班，把主力放在了西南角上。果然不出所料，嚣张跋扈、作恶多端的李青山特务连，从刘家集直接返回大王桥的途中，大摇大摆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战斗一打响，敌人被正面的排枪打懵了，撒腿往东跑。埋伏在东面的战士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如猛虎下山，发起了勇猛的冲锋。一个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曹的战士（他的名字记不得了），一西端着枪朝敌人猛扫，一面高喊：“冲呵！别让鬼孙子们跑了”！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扭头就往西南逃窜，正好全部落入了我们的“网底”。李青山的特务连六十多人，一个也没有漏网，就这么干净、彻底、全部被我们消灭了。我们的老曹同志在作战中负了重伤，后来又因破伤风感染不幸牺牲了。

一九四三年春天，敌人又一次集中了大批兵力向我清河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春季大“扫荡”。

为了迷惑和牵制敌人，减轻对清河区的压力，我们组织了一次四县边区游击部队的统一行动。一天夜里，我们把各个地方的小分队都调到了刘家集，还借来了许多洋油桶、鞭炮。战士们笑着说：

“这些玩艺恐怕不行，到时候可别露馅喽！”陈瑛说：“不要紧，隔远点，人听不清，能造声势就行！”

队伍出发了，战士们扛着各种各样的“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乘着夜色行进着，长长的队伍足足拉了一里地。陈瑛同志指挥着队伍，县委的同志几乎都去了。我们分别从西面和南西突进了李马庄，随后就分头搜捕敌人的便衣特务队，并派出一部分战士向群众展开宣传。第二天，老百姓听到据点里的敌人心有余悸地说：“可不得了啦，八路军来了一个团哇！还带了两挺机关枪。”他们哪会想到，所谓的机关枪，只不过是我们在洋油桶里放鞭炮而已。

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说不定哪一天被八路军端了炮楼子。趁敌人对我方捉摸不定，我们又组织各区中队分头出击，在阳河、崖头、黄桥等地打了一系列伏击战，进一步震慑了敌人。其中阳河一仗打得最漂亮，一枪未放，巧夺了汉奸刘顺天特务队的枪库，缴获步枪三、四十支。

我们打了一系列伏击战后，不少伪村长、伪保长领教了“四边特务大队”的厉害，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欺压八路军家属和老百姓了，而且怕我们晚上去“锄奸”，还千方百计想和我们拉拉关系。我们呢，就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用一个白萝卜刻了颗“八路军四边特务大队”的公章，写了公文到处去张贴，使得敌人弄不清我们到底在哪活动，不敢胡作非为。我们还凭着这颗“萝卜大印”，向汉奸、地主和乡绅要粮、款和土布。他们不敢违抗，只得乖乖地把东而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既打击了敌人，又解决了我们一部分困难，还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三

为了不断扩大战果，我们配合武装斗争，向敌伪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我们给那些伪军、汉奸、保长、甲长之类的人写信，指名道姓地告诉他们，当亡国奴不行，做走狗汉奸更可耻。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小鬼子长不了啦，别再替鬼子卖命了。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弃暗投明，也应该“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八路军办事出力。

一九四三年春节，我们向敌人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攻势。记得除夕晚上，我们县委的

几个同志领着人到敌人岗楼附近，用纸糊的大话筒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不当亡国奴！……”陈瑛同志还以四边特务大队的名义向炮楼里的伪军下了通牒：“初一到初三，不许你们下炮楼，不许残害老百姓”！这办法很有效，初一到初三，伪军不仅没敢出来作恶，有的还派人来找我们拉关系。

在政治攻心，瓦解敌人的工作中，同志们想出了不少巧妙的办法，涌现出了许多赤胆忠心有勇有谋的好同志。刘汉鼎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次，组织上派他深入到敌占区去，没有“良民证”，我设法从敌伪关系那里搞来了一张没盖钢印的空白证。刘汉鼎同志灵机一动，就借了个“良民证”，先把钢印临摹下来，再把纸样印刻在一块砚台的背面，用力一压，终于压出了一个“钢印”。后来听说，刘汉鼎同志在敌占区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最后在胶济大队时，被叛徒出卖而壮烈牺牲了。

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在政治攻心，瓦解敌人的工作上花了一定的气力，先后与周围敌人八个主要炮楼中的六个取得了联系，加之上级又转给了几个已经成熟的伪军关系，这样我们的活动就方便多了。陈瑛同志常常带着武装人员在敌人的炮楼间穿插来往，那些跟

我们拉上关系的伪军不仅不干涉，有的还设法给予协助。瓦解敌军工作取得的另一成果是，在军区促成王道伪军一个团起义的同时，我们也使苏景三的伪军中队举行了反正，并且当机立断，让我的一个排换上苏景三部的伪军衣服，由苏景三的一个分队长带路，在特派员黄金龙同志率领下，化装智取了孟家集炮楼，歼灭了伪军一个中队。

就这样，我们靠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逼得东、西、北三面的敌人纷纷撤出了据点。我们又乘胜拔掉了蓬科、刘家铺、六端等一系列据点，在那些地区恢复了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三年秋天，日伪在四边县苦心经营的据点，已全部被我抗日军民拔除，四边县又成了抗日军民的天下。

四

四县边区之所以成为敌人难以征服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个重要原因是那里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四县边区就有我们党的活动，抗日战争一开始，那里的人民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前仆后继，顽强斗争，始终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

重大贡献。

被誉为“抗日模范村”的东朱鹿，是一座摧不垮的战斗堡垒。这个位于益都县北部的村子，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建立了党的支部。抗日战争开始后，东朱鹿村的群众在党支部领导下，不但多次接待和掩护了山东省委、鲁东工委和县委的领导同志，而且自制手榴弹，伏击日伪军。敌人对东朱鹿恨之入骨，多次进行血洗，仅全家被杀绝的就有七户。但东朱鹿的党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息，东朱鹿的群众一天也没有放弃抗日工作。

地处四边县北部的刘家集，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点村。一九四二年“七一”“扫荡”后，我们隐蔽在庄稼地里，都为砍了高粱秸以后的局面担心。当时区党委、军区首长及时指示我们：高粱秆组成的青纱帐是我们目前“存在”的条件，要利用这个“存在”，抓紧时间做好群众工作，群众是永远砍不倒的“高粱秆”！是呵，这话说得多么深刻呵！于是，我们采取“滚雪球”的方法，从一家一家建立基点户开始，发展到基点胡同，最后建立了基点村。刘家集这个基点村，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这是个比较大的村子，有上千户人家，村子里党的基础很好，地形也有利于我们同敌人周旋。我们常常在那里活动，村里群众掩护过我们许多干部。县委领导成员中有三个人